

西安经典旧志稽注

长安县志

〔清〕张聪贤 修

〔清〕董曾臣 纂

董健桥 校点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董 军

副主任 吴义勤 何 元 王武平

周爱全 朱三计 冯艳阳

委员 俞树平 薛振虎 蒋少宁 乔安涛 刘铁泉

王炳南 强晓安 李颖科 张新民 王尊敬

罗亚民 李宁君 张印寿 苗宝明 任立新

冯慧武 张永科 吕恒军 严 彬 刘顺智

李利民 郑育林 白正谊 崔玉凤 尤晓民

王军平 王作权 夏泽民 李长安 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陈国庆 甘枝茂

王双怀 张应超 牛 昉 康志祥

西安地情资料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冯艳阳

副主任 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 耀 杨军亚 姚文东

高 鹏 高长安 崔义萍

崔桂琴 富小云 彭栋为



陝西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1815）《長安縣志》

嘉慶乙亥年鐫

長安縣志

學署藏板

織室百官表少府有東織西織令丞河平元年省東織西
 織為織室黃圖未央宮東西織室織作文編郊廟之
 服有暴室黃圖在未央宮漢宣帝紀注應劭曰暴室者官
 令史暴室人獄也今日薄室師古曰瘞庭主織作染練之
 署謂暴室者取暴曬為名耳或謂薄室薄亦暴也織務既
 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故謂暴室獄耳本非獄名應說
 失蒼池漢書鄧通傳注未央殿西南有滄池池中有漸臺
 之也括地志口既云就車而至漸臺雖未央建章複道相屬
 但漢兵既迫不應駕車踰城則未央建章似各有漸臺非
 一也所鉤盾弄田漢書昭帝紀元始元年帝耕于鉤盾弄田
 官者近署故往獸園籠園黃圖獸園九籠園
 試耕為戲弄獸園籠園一在未央宮中

右未央宮

建章宮雍勝屠在長安故城西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
 月柏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
 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
 章宮長安志引關中記建章宮其制度事兼未央周回二
 十餘里漢鄧祀志建飛閣黃圖武帝于未央營造日廣以
 章宮度為千門萬戶飛閣城中為小乃于宮西跨城池作

長安縣志 卷二十 宮室志 六

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長安志引三輔故
 事建章殿東別起閣高二十五丈馮高以望遠閣闔門
 黃圖宮之正門高二十五丈亦曰壁門漢書曰建章宮南
 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
 玉為之婦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樓屋上鳳闕史記封禪書
 下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名壁門鳳闕建章前殿東
 則鳳闕索隱高二十五丈黃圖壁門左鳳闕黃圖建
 漢書注俗呼為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闕章宮門
 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鳳赤眉賊壞之古歌云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長安志引關中記
 章宮圓闕有金鳳在上故號別風闕西京賦闔闔之內別
 風闕是復以貞闕為鳳闕矣別風闕風嗷嗷長安志引關
 中記建章宮東有折風闕一名別風闕薛綜西京賦注
 風高二十丈以言別四方之風也熒熒闕熒熒次門女闕
 也在圓闕門北闕黃圖引廟記高二十中龍華門見漢武
 內二百步北闕丈建章宮北闕門也中龍華門故事
 前殿漢書郊祀志建章西德殿黃圖建章宮有西德等二
 元年前殿度高未央西德殿十六殿漢書宣帝紀神會
 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承光殿見西唐中庭封禪書建章
 數十里索隱唐堂庭也漢志作商中師古曰鼓簧宮黃圖
 商金也于序為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鼓簧宮引漢

同治辛未夏初嘉自右扶風暈移長安求邑乘不可得緣
板存學署歲久殘缺幾半乃訪於藏書家得之知爲嘉慶
乙亥吾鄉張公聰贊茲此所修今甲子將周且更變故其
間廢興沿革及忠孝節烈之行不可弗彰屢擬與耆老重
事採脩奈時局方艱甘氛未靖又自苦庸迂日困於供張
奔走卽簿書有未盡究圖者違云搜紹而闡彰耶姑仍其
舊而補刊之謹皮署中以俟君子值手民告成爰綴數語
於簡末自誌其有志未逮云

同治壬申初庚日宣城方啟憲識於居大不易之軒

長安縣志

民國廿五年
十月重印

民國二十五年（1936）重印嘉庆《长安县志》书影

京城 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
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六典皇城在京城
之中宮城在皇城之中

宮城 長安志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新唐書志 周一
少十步

有掖庭宮按宮城即西內
詳見宮室志

皇城 長安志俗號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
百四十步新唐書志作長一千九百
一十五步廣一千二百步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按
應麟云隋文立制土庶不得雜居
朱雀門故宗廟宮寺兵衛悉在焉北當宮城之承天門掖即宮城
正南門

南當外郭之明德門東曰安上門至德三載改曰光天門尋復舊
西曰含光門東面二門南曰景風門北曰延喜門直東當外郭之
通化門貞元四
年修延喜門複道屬于承天門同鸞使及同鸞公主至德宗御延
喜門觀之宣宗御延喜門見河隴老幼數千人賜以冠帶案唐會

長安縣志 卷十二 土地志下 三

要龍紀元年御延喜門受俘乾寧二年御延喜門受俘誠新唐書
儀衛志皇太子函簿出延喜門公主傳岐陽公主下降帝御延喜
門止西面二門南曰順義門北曰安福門西當外郭之開遠門朝
野餘載曰睿宗先天二
年正月十五日十六十七夜于京安福門外作燈輪式元衡赴西
川鄧度憲宗御安福門慰遣之懿宗御北門迎佛骨昭宗天福元
年御安福樓案唐書睿宗先天元年正月幸安福門觀醜七月
幸安福門觀樂郭子儀傳自涇陽入朝御安福門待之樓上朝見
及薨御安福門哭之杜元穎傳為西川鄧度使帝御安福門臨錢
唐會要先天元年御安福門賜公卿射二年六上皇御安福門賜
百寮射舊唐書昭宗紀御安福門樓觀軍容使西門重玉海引
唐實錄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睿宗太極元年御安
福門宴奕馭延和元年御安福
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

外郭城 長安志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
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隋開皇二年築唐永
徽四年率天下口稅一錢更築之按冊府元龜永徽三年修築京
師羅城新唐書志長六千六百
六十五步廣五千五百七十五
步周二萬四千一百二十步南面三門正中曰明德門北當皇
城朱雀
門南出抵中南山八十里按會要員半千王廟為東曰啓夏門西
宏文館學士與著作路敬淳分日於明德門待制

三影書志《長安縣志》嘉慶重印(1936)年五十二年國民

前 言

长安，“为雍秦之首邑，帝王之故都。终南峙其前，渭流绕其后”。西周为京畿之地。秦代为国都咸阳一乡聚之名，秦王政封其弟成蟜为长安君；秦二世三年，楚怀王封项羽为长安侯。《史记》《汉书》俱称：“长安，故咸阳也。”汉初，刘邦采纳娄敬、张良建言，定都长安，于汉高祖五年（前202）置长安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分关中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是为三辅”。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于长安县分置奉明县。至东汉建武六年（30），省奉明县入长安。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均曾迁都长安。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长安先后成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多个政权的首都所在。北周明帝二年（558），分长安、霸城、山北三县地，于长安城中置万年县。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杨坚即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侧“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的地方建造新都“大兴城”。开皇三年（583），改万年县为大兴县，与长安县分治大兴城中。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城，高祖武德元年（618），改大兴县为万年县，仍与长安县分治长安城中。高宗总章元年（668），于长安县析置

乾封县，后又并入长安县^[1]。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改长安县为大安县。后唐同光三年（925），复为长安县。此后，宋、金、元、明、清俱为长安县，与咸宁（万年）县分治西安（宋称永兴军路京兆府，金称京兆府路京兆府，元称安西路总管府，皇庆元年改为奉元路，明、清称西安府）城中。民国二年（1913）二月，撤销咸宁县，并入长安县，结束了西安城两县分治的历史。

“长安自古帝王都”，这里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历代盛世都形成于此。其深厚凝重的文化积淀，奋发向上的人文精神，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淳朴敦厚的民风习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二

有关长安的历史典籍史不绝书，除历代正史、总志，省、府志书无不涉及而外，以长安为记述主体的专门著作亦影响深远：汉有《三辅黄图》、辛氏《三秦记》、赵岐《三辅决录》等名著问世；晋有葛洪《西京杂记》、潘岳《关中记》；唐有韦述《两京新记》等；宋有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程大昌《雍录》；元有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等中国方志史上有影响的著作播行于世。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时任长安县知县李华然主修，长安籍著名学者冯从吾主持编纂的《长安县志》完成，这是长安县历史上第一部以本县境域为记述范围的县级地方志书。清代康熙初年，长安县知县梁禹甸“求得旧本，更加附益”，编纂成八卷本《长安县志》，于康熙七年（1668）付梓。

[1] 此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长安县，“总章元年析置乾封县，长安二年省。”《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长安县，“乾封元年，分为乾封县，治怀直坊。长安三年废，复并长安。”

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时任长安县知县张聪贤,以“今长安自康熙以来百五十年,志乘不备”为忧,遂“咨于耆长,集议重修”,聘请当时客居陕西的江苏籍著名学者董曾臣主持编纂,修成三十六卷本《长安县志》,于嘉庆二十年(1815)镌刻成书,此即本次校点整理之《长安县志》。

张聪贤(?~1831),字爱涛,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二甲第四名进士^[1],授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三年,选任陕西甘泉县知县;十五年,调任长安县知县。“以卓异”,升直隶州同知,因母丧告归。服阕,复任长安县知县。于道光二年(1822)升任潼关厅同知,兼权同州府事,加知府衔。

张聪贤两任长安县知县,政绩突出,口碑甚佳。史籍称其“性朴素,裘马不饰,居官十馀年,未演剧饮宴,惟以振起士习民风、兴利除害为己务”。其“善政尤多”,主要有四:一是重视教育,“创义学二十馀所,以训蒙士,时亲考课、行赏罚”。二是移风易俗,曾亲撰《村规》《再题村规》,“设立规条,撰通俗诗句,择素行公正者为乡约长,多方化导,弊俗遂革”;尤其是重视民族问题,注意民族团结,“境内回民旧有礼拜寺,月朔咸集。君因其俗,时往为讲说孝弟忠信、廉耻礼义之事,而剖析是非,回民德之”。三是纂修《长安县志》,“县志不修百馀年,君捐俸设局采访,四载告成”。四是兴修水利,“县旧有苍龙河,年久淤塞,每秋涝,山水冲突,没长安民田万五千亩、鄠县田五千亩、咸阳田三千亩。聪贤循视河道,劝村民分段开浚河身,兴筑沿河堤岸。移书咸、鄠两邑亦如之。其去民居远者,不便拨夫,则捐俸以浚之。一年而工竣,河患遂息。居民设位瞻拜,名其河曰‘张公河’”。此外,尚有修葺县学、县署、常平仓,恢复义冢等善举。道光十一年六月,

[1] 据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四十方宗诚撰《循吏张君传》:张聪贤“嘉庆辛酉成进士,丁外艰,归。乙丑补行殿试。”

卒于潼关厅任上。枢归之日，哭奠者数十里。长安士民上书申请，奉诏入祀名宦祠。^[1]

张聪贤为官清廉，卒，囊橐萧然，家属竟不能归。^[2]

董曾臣(1791 ~ 1823)，字方立，又名祐诚^[3]，江苏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少时治算学，多有成就。讷于言而善属文，得汉魏六朝神髓。尤致力于律历、数理、舆地、名物之学，讲求典章、礼仪、政治之要。善深沉之思，聪颖过人，文理兼通，“书之号钩棘难读者，一览无不通晓，复为出新意、阐隐曲、补罅漏”。著述甚多，于数学尤有造诣，有《割圆连比例术图解》《椭圆求周术》《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堆垛求积术》等著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十一，随其师陆耀通游历陕西，作《西岳华山神庙赋》，“名大著，长安为之纸贵”；又至兴平马嵬坡，制杨贵妃墓碑，被誉为“沉博绝丽，他手无能及”。应长安县知县张聪贤所请，主持编纂《长安县志》，历时四年，于嘉庆二十年成书。卒于道光三年，享年三十三岁。其兄董基诚取其《历算稿》五种，附以《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及遗文甲集、乙集、《兰石词》等，编为《董方立遗书》八种存世。^[4]

嘉庆《长安县志》编纂之时，冯从吾纂明万历《长安县志》经明末战乱，“侵板散失，世无传本”。而梁禹甸纂康熙《长安县志》“既病简略，复为后人所窜乱，展转乖刺”，因此可资借鉴的前代志书甚为有限，编纂者只能“订正旧规，更举新例”。《志》中大

[1] 以上所录，兼采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四十《守令·循吏张君传》、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六十八《名宦·张聪贤传》，及本志所载。

[2]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六十九《名宦·吴鸣捷传》：“潼关厅桐城张聪贤卒，家属不能归。时鸣捷典质一空，计无所出，乃自支养廉银八百金尽付之。”

[3] 《续碑传集》卷七十二李兆洛撰《董君方立传》：“方立讳祐诚。初名曾臣，乡举后乃更今名。”

[4] 以上所录，兼采《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艺·董祐诚传》、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二《儒学·董君方立传》、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八十五《人物·董祐诚传》。

量资料为编纂者实地采访及考察所得，真实记录了清代中期长安县的实际状况，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清同治十年（1871）夏初，安徽宣城人方启宪调任长安知县。“求邑乘，不可得”，而学署所藏嘉庆《长安县志》原版则“岁久残缺几半”。方遂有意于重修县志，奈何因种种困难而未果，仅依长安县学署所存部分旧版及藏书家所存嘉庆《长安县志》原书再次补刻重印，于同治十一年付梓，此即现存之同治版《长安县志》，其内容与嘉庆本一致，而用纸、刻工则逊于嘉庆本。该书有方启宪小序云：

同治辛未夏初，宪自右扶风量移长安，求邑乘，不可得。缘板存学署，岁久残缺几半。乃访于藏书家，得之。知为嘉庆乙亥吾乡张公聪贤莅此所修。今甲子将周，且更变故，其间废兴沿革及忠孝节烈之行，不可弗彰。屡拟与耆老重事采修，奈时局方艰，甘氛未靖，又自苦庸迂日，困于供张奔走，即簿书有未尽究图者，遑云搜绍而阐彰耶。姑仍其旧而补刊之，谨度署中，以俟君子值手民告成。爰缀数语于简末，自誌其有志未逮云。

同治壬申初庚日，宣城方启宪识于居大不易之轩。

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通志馆再次以铅字排版，重印嘉庆《长安县志》，是为民国本。民国本在保持原书整体面貌的前提下，亦纠正了原志中个别字词之误。

三

嘉庆《长安县志》历来受到后世的赞赏与好评，民国著名学者宋联奎赞称：“前志出自阳湖董氏手笔，辨正旧闻，足资考证。

蒋氏湘南^[1]谓之为名地名作、冠绝古今者也！”^[2]

本次整理校点，以三十六卷本清嘉庆《长安县志》为底本。原志木版刊刻，分六册线装；每半页十一行，每满行二十二字，间小字双行；花口，单黑鱼尾；鱼尾上为书名，下注卷数、篇名和页数；四周单边。以民国二十五年陕西通志馆重印之嘉庆《长安县志》为校本。此本以铅字排版，分六册线装；每半页十二行，每满行二十六字，间小字双行；花口，单黑鱼尾；鱼尾上为书名，下注卷数、篇名和页数；左右双边。

嘉庆《长安县志》是一部“通志”性质的地方志书，其记述时限，上自远古，下迄嘉庆十七年（1812），贯通三千余年长安历史，是长安县自有史以来，内容最为详备的一部地方志书。

嘉庆《长安县志》重视编修地方志书的政治意义和实用价值，其在《志例》中指出：

郡县之志，例在蒐讨掌故、褒扬哲义，盖古者外史之流。特其体书美而不书恶，识大而不遗小，至于斟酌故训，推见至隐，行善而备败，其归一也。近世为志，不明此义，于山川则侈景物而原委反略，于人物则录支节而纲目不具，于艺文则摭题咏而著述不载，于政事兴革、民生吏治之大者，则多阙略而不周，岂国家所以辨地会、考文献，以润泽政治之意哉？

嘉庆《长安县志》体例完备、规范，全书以图、表、志、传为纲，分类记述，对长安之历史沿革、历代建置疆域、山川水利、城郭乡镇、田赋、学校、衙署、官室、金石遗存、历代著述、各类人物及历史大事，均有较为详尽记载。尤其是该志所绘地图富有特色，

[1] 蒋湘南，字子潇，河南固始人。清道、咸间著名学者，“以著作名大河南北”，纂有多部方志作品。

[2] 见宋联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序》。

其一改传统志书以“示意”方式之附图，而“以开方为经纬”，“辨方位、识道里”，使图中要素间相对位置、距离更为准确，实为制图方法上的一个进步。

嘉庆《长安县志》资料丰富、来源广泛，全书征引历代正史及各类文献典籍数百种之多，内容全面，考证严谨，文字精炼流畅，文风朴实。其《山川志》，详尽记述了县境内山塬、河流以及水利设施、灌溉效益等。其《田赋志》，则详实记载了嘉庆时期长安县耕地面积、等级、赋役以及税赋征收、支出等基本状况，并列出了各级官吏薪俸收入。其《土地志》，则记述了长安县自置县以来历代境域、“八到”、城市建设、乡镇等，尤其是准确记载了清代嘉庆时长安县的户数、人口，全县十八廩及所辖全部村庄名录。其《晷度》《纪事沿革》（上、下）《职官》《选举》五卷，则以列表形式，记载了长安县二十四节气时刻，以为“农事之准则”，以及历代大事、职官任职和科举选拔情况，资料翔实而珍贵。

嘉庆《咸宁县志》还结合实地调查，对史籍记载提出诸多辩证分析，如对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关于长安周围水道的记载，就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既肯定了《长安志》“足补《水经注》之遗”，又专附《山水辨误》，指出了诸如《长安志》《陕西通志》《西安府志》《太平寰宇记》《雍大记》等典籍的一些误记，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期长安周围山塬、河流等地理要素的实际状况。对前代志书如康熙《长安县志》之误载，亦予以删补；对其“所有逸事异闻、诸篇语怪无征，皆所不取”。其说言之有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嘉庆《长安县志》在引述历代有关长安的大量文献典籍，以及经过实地测量、调查而形成的第一手资料而外，还以小序、按语等形式表述了纂修者对历史、地情的见解和感受，在《宫室志》小序中，纂修者写道：

观其都邑之建置，宫馆之兴废，宅第之盛衰，而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劳逸，财用之息耗，风俗之醇薄，一一见焉。世之载笔者往往述其遗迹，以为骚人逸士感慨凭吊之资，又其末也。

在《风俗志》中，对长安北、西、南三乡（东为咸宁）民风习俗有如下评述：

长安附治会城，辐辏交午，阡陌崇比，五方杂居，不可区域。北乡地据龙首，土燥水深，时虞旱坼，俗尚勤俭、鲜争讼。西乡地衍濒沔，常病涝溢，而土田沃饶，民重稼穡，士习《诗》《书》，犹有丰镐之遗风焉。南乡交、潏以北，俗同西乡；南则山川环带，风俗淳古。终南谷水初出，水高易渠，故地宜秔稻；缘山柿、栗，岁供租课；子午、石鳖诸谷，道通兴、汉，商旅络绎，市多榷酤，此其大较然也。聪贤承乏兹土，深惧弗克负荷。邑最繁剧，然号易治。其士大夫颇顾惜名节，其民鲜黠猾，教之以善，则如响应声。朱子所称“厚重质直”一语，为百世不易之论。鼓舞而维持之，益用自勉，并于都人士有厚望焉。

张聪贤、董曾臣均非本籍人士，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对千年古都长安的感悟和体验。

四

嘉庆《长安县志》历时四年编纂完成，用力之勤、用功之深可以想见。主持编纂的年方二十出头的青年学者董曾臣，其文笔、才华、学识令人赞佩。但毕竟长安历数千年沧桑，其间山川陵替、建置分合、城市兴衰、人事变迁，非有长期深入之研究，难免也